

论习近平《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再认识》 一文的学术贡献

□ 郭冠清

摘要:2001年习近平发表了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和理论品质的论文《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再认识》,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大理论问题进行了系统的研究,是一篇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重要文献。在这篇文献中,习近平主要从五个方面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行了探索:一是摆脱“苏联模式”将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归结为“生产关系”教条影响,将《资本论》研究对象概括为“市场经济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提出并论证了“如果《资本论》不甚适于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话,那么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却具有重要实践意义”论断;二是对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能否相容和如何融合这一基础理论问题进行了论证;三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进行了研究,对包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内的三大理论体系优势和缺陷进行了分析,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应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主干、兼收并蓄西方经济学的成果的重要思想;四是在对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都是建立在西方历史、文化和哲学传统的认识基础上,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立足中国历史、文化和哲学传统的系列思想;五是结合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对政治与经济的关系做了精辟论述,对于理解中国经济增长奇迹和进一步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实践有着十分重大的理论价值。认真研究作为学者的习近平的这篇文章,对于理解和把握习近平主政以来的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对象;唯物史观;经济与政治;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

中图分类号:F10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402(2018)01-0019-08

一、引论

经过长期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和马克思经典著作的学习,习近平在2001年发表了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和理论品质的《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再认识》一文,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大理论问题

基金项目: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智库建设”的阶段性成果。本文的研究得到2016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探索”(项目编号:16ZDA002)、中国社会科学院“《资本论》研究优势学科建设课题”的资助。本文思想的形成得益于王立胜书记主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大纲》编写组讨论,感谢胡家勇研究员在研究过程中的帮助和指导!感谢王瑶副研究员在论文写作和校对方面的帮助和支持!

作者简介:郭冠清(1967-)男,河北邯郸人,经济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资本论》研究室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智库办公室主任、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副主任。

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与政治经济学领域普遍缺乏学理支撑的报刊文章不同,这是一篇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具有学理支撑的学术论文。在这篇至今仍未得到学术界足够重视的文献中,^①习近平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些重大问题进行了探索:一是摆脱“苏联模式”将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归结为“生产关系”的教条影响,将《资本论》主要研究对象概括为“市场经济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提出并论证了“如果《资本论》不甚适于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话,那么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却具有重要实践意义”的论断;二是对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能否相容和如何融合这一基础理论问题进行了论证;三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进行了研究,对包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内的三大理论体系优势和缺陷进行了分析,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应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主干、兼收并蓄西方经济学的成果的重要思想;四是在对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都是建立在西方历史、文化和哲学传统的认识基础上,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立足中国历史、文化和哲学传统的系列思想;五是结合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对政治与经济的关系做了精辟论述,对于理解中国经济增长奇迹和进一步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实践有着十分重大的理论价值。认真研究作为学者的习近平的这篇文章,对于理解和把握习近平主政以来的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具有重要的意义。接下来,我们走近习近平,以《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再认识》(以下简称“习文”)原文为线索,对这五个方面进行梳理,近距离感受他作为学者和实践工作者的洞察力。

二、《资本论》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指导意义

这篇论文是时任浙江省人民政府省长的习近平在攻读清华大学人文社会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博士研究生期间,重读《资本论》的思考。自然,思考的第一个问题是,《资本论》是否适合指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

要回答《资本论》这部批判著作是否可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指导,首先就必须弄清楚《资本论》的研究对象。虽然文中没有直接对“苏联模式”进行批判,但是,习近平清楚地知道,一个只研究“生产关系”的理论是无法用来指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

对于《资本论》的研究对象,尽管如习文所言,《资本论》开宗明义地就讲道“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但是要对其研究对象做出科学的判断并不容易,因为这里面涉及两个难题,一是这句话翻译的错误,正确的翻译应是“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和交换条件”,注意原文中的Produktions-und Verkehrrsverh ltnisse中的verh ltnisse应该翻译为“条件”而不是“关系”(郭冠清,2015b),二是与生产关系相适应的是生产方式而不是生产力,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还存在“生产方式”(吴易风,1997;郭冠清,2015a)。对于翻译的错误,虽然习近平在当时不可能知道,但他没有陷入“苏联范式”的陷阱之中。对于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是否还存在“生产方式”,习近平虽然没有做出判断,但是他对《资本论》的研究非常深入,习文中直接引用了《资本论》第三卷相关的叙述,并在后文中引用了马克思在《资本论》脚注中把《〈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修改成“一定的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话“在那本书中我曾经说过,一定的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②借助于逻辑的力量和《资本论》内容的佐证,习近平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论述的“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

^① 通过知网检索发现,截至2017年10月15日,将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再认识论文列入参考文献的仅28篇(含报纸和学位论文),而且没有一篇专门研究的论文,但含有习近平篇名的报刊文献数万篇,仅2016年就有9411篇。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译本)第二版,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00页注33。习近平引用的是中文第一版第88页注33。

换关系”是一个综合体,并不是当中的某一个方面。尽管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没有一处提到过市场经济这个名词,但从马克思的论述中,可以看出,“马克思的《资本论》所研究的主要对象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对于“市场经济”,习近平给出了两个基本命题,即“市场化的商品经济就是市场经济”和“高度资本化的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既然《资本论》所研究的主要对象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那么《资本论》所阐明和揭示的资本主义生产的一系列基本原理和运行规律就“构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骨骼和血脉,形成一个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但是用《资本论》的理论去指导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生产时问题就出来了,对此,习近平评价道:“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揭示的原理和规律虽然是科学的,其中一些原理和规律还具有一定的社会共性;……但是,由于马克思的《资本论》毕竟是以资本主义生产为研究对象的,它所揭示的许多原理对于社会主义生产来说,必然带有明显的社会局限性,其中的一些论断和规律难以用来指导以产品经济为基础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实践。”

习文对将《资本论》关于市场经济的原理应用于计划经济的批判是耐人寻味的,非常值得反思。“所谓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理论,实际上是后人将自己的思想和认识硬加到马克思头上的,把不是马克思的东西说成是马克思的,给历史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因而也就不可能去有效地指导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具体实践。”

对于《资本论》是否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指导意义,从以上的论述中已经可以得出结论,习近平讲道:“如果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示的关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原理和规律难以适用于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计划经济的话,那么,对于我们当前正在大力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却具有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这是因为,无论是私有制的市场经济,还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只要市场经济是作为一种经济运行机制或经济管理体制在发挥作用,市场经济的一般性原理及其内在发展规律同样都是适用的,^①诸如价值规律、竞争规律、供求规律、积累规律、社会总产品实现规律、利润最大化原理、提高利润率和积累率的方法、竞争与垄断理论、经济危机理论等,都同样适用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正是从这一意义上来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揭示的科学原理并未过时,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依然闪烁着真理光芒,越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越是我们必须深刻地去学习和掌握《资本论》所阐述的这些科学的共性原理,并善于运用这些原理去指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伟大实践。”

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必须把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融为一体

通过上一节论述,我们已经清楚,《资本论》所揭示的市场经济的一般性原理及其内在发展规律不仅适合私有制的市场经济,也适合公有制的市场经济,对于指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但对于市场经济这一“与资本主义私有制浑然一体的经济运行方式”是否能够与社会主义有效结合这一“亘古未有的崭新事业”,尚没有解决。习文结合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历程,对党的十四大以来在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的探索进行了回顾,并对“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能否相容”的五种观点进行了阐述。接着,习近平对邓小平突破“社会主义等于计划经济”的思想禁锢,在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方面做出的贡献进行了高度评价,并指出:“邓小平同志这些论述是科学的,符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之所以如此,习近平从跨越“卡夫丁峡谷”的俄国革命入手,对此进行了论证,构成习文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19世纪80年代,马克思提出了著名的飞越‘卡夫丁峡谷’的思想,指出一些发展落后的国家可以越过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它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吸取资本主义制度取得

① 黑体为本文作者所加。

的一切成果。……’如果它在现在的形式下事先被引导到正常状态,那么它就能直接变成现代社会所趋向的那种经济体系的出发点,不必自杀就能获得新的生命。”

确实,对于经济发展落后的国家在社会制度上能否越过“卡夫丁峡谷”,马克思在1882年《共产党宣言》俄文版序言中做出了明确的回答:“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①也就是说,马克思除了对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革命“共同胜利”论断外,还有对落后国家社会主义革命是否能“一国胜利”的思考。至于落后国家飞越“卡夫丁峡谷”后的社会主义建设是否能逾越商品生产阶段,习近平给出了有力的论证,并得出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相容性的结论。

“经济发展落后的国家在社会制度上能够越过‘卡夫丁峡谷’,并不等于它们在经济发展上也必然能够越过商品经济的‘卡夫丁峡谷’,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来没有这样的表述和设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也充分证明,商品经济是那些经济基础薄弱、发展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不可逾越的发展阶段,俄国如此,由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中国更是如此。既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乃至整个社会主义阶段都离不开商品经济特别是发达的商品经济,这就决定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是相容的。同时,也正是基于这一根本原因,决定了《资本论》所揭示的科学原理,对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在论证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可以相容”之后,有着丰富实践经验的习近平并没有就此打住,而是对两种制度与市场经济的耦合程度进行了分析,得出了“市场经济是与资本主义私有制浑然一体的经济运行方式”和“就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社会制度的关系而言,它(指市场经济)对资本主义的适合程度明显地高于社会主义的适合程度”。由此,“要使社会主义能够像发展资本主义那样推动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并不是一件自然而然就能发生作用的事情,决不像摆积木那样放在一起或用外力将之硬性摆在一起那样简单。”只有“防止顾此失彼、以偏概全”和“纠正和防止新旧体制‘劣势组合’”两种错误倾向,通过扬长避短、趋利避害,才能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与市场经济体制的优越性有机融合在一起,使之成为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合力。该部分论述为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提供了理论支撑。

四、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体系并坚持“学以致用”

没有理论指导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因此,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伟大实践必须建立与它相适应的科学理论。由于正在建立和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项亘古未有的崭新事业,因此,不可能有完全与这一崭新伟大的社会实践吻合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不过仍然有一些市场经济理论可以借鉴,习近平讲道:“一种新的社会实践在未产生理论之前,不可避免地要向与之相关的理论体系寻求理论借鉴;……应该说迄今为止,人们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经验是丰富的,理论发展也达到了较高阶段,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三大经济理论体系,但是,尽管三大现代经济理论体系都分别从不同的层次、角度揭示了市场经济的一般原理和规律,对于我们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基础框架和一般机制具有较强的借鉴和指导作用,而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宏观发展来说,又都具有各自的局限性。”

或许受到学术界颇具争议的樊纲(1990)的影响,习近平对三大现代经济理论体系都给予了高度评价,指出“三大现代经济理论体系都分别从不同的层次、角度揭示了市场经济的一般原理和规律”,但是与樊纲不同的是,习近平从“借鉴人类一切文明成果”的高度去思考如何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而不是试图综合三大现代经济理论体系。应该说,习文对三大现代经济理论体系的优势、缺陷和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版,第326页。

局限性的客观分析,对于纠正“非左即右”的学风做出了贡献。尤其是对马克思经济学和马克思以后经济学的评价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首先,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面来看,由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是以资本主义生产作为研究对象的,他通过对生产方式和社会经济关系的深入分析,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规律以及人类社会发展的某些共同的发展规律,对于我们正在进行的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但马克思所创立的经济学理论也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人与物的关系和物质生产与需要在微观经济变化过程中的决定作用,从而不能全面地说明资本主义经济中的许多具体问题。而且其中一些能够反映资本主义经济特殊性的原理,也无法用来说明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一些特殊经济问题;而马克思以后的一些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研究,由于其研究的是以产品经济为基础的属于共产主义阶段的经济问题,因而尽管有其自身的逻辑合理性,却不适合用来指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存在的这些不足,使其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的指导受到了明显限制。”

在对马克思经济学的优势及其局限“忽视了人与物的关系和物质生产与需要在微观经济变化过程中的决定作用”和马克思以后经济学“不适合用来指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科学判断的基础上,习文对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进行了评价,其中“它们都将社会关系排除在研究范围之外”和“三个不承认”独具匠心。

“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主流经济学方面来看,由于二者都是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角度来研究市场经济,尽管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对人的需要与资源配置、技术选择的关系进行比较详尽和深入的分析并达到了相当高的科学水平;尽管凯恩斯主义主流经济学在继承古典主义经济学的有关成果的基础上揭示了信息、预期等因素在经济运行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但它们都将社会关系排除在研究范围之外,不承认经济活动的特殊社会规定性和社会经济关系在经济运动中的决定作用,不承认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关系所决定的无政府状态与经济循环和危机的内在联系,不承认资本主义有效需求不足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等等,因而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研究相比,就有着更为明显的缺陷。”

在完成了现代三大理论体系的分析之后,习近平结合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实践,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体系的三点“粗浅认识”,而这三点“粗浅认识”就笔者本人的认识看,给还在摸索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建设指明了方向。我们分别介绍如下。

“第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建立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主干,兼收并蓄地吸收西方经济学有关市场经济的理论研究成果。”习文在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深入分析基础上提出的“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主干”排除了林毅夫(2017)的“以现代西方经济学范式为基础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可能。同样,习近平建立在坚实的分析基础上提出的“兼收并蓄地吸收西方经济学有关市场经济的理论研究成果”对于纠正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建构中出现的将西方经济学仅仅看作是意识形态而忽视其工具属性的错误倾向指明了方向。习近平在2016年5月17日哲学社会科学会议上讲话时重新提出了这一点。

理论来源于实践!习近平在“对现代三大经济理论体系无论怎样进行比较和综合,都只能停留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范畴”洞察基础上,提出了“第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必须善于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经验进行总结和概括”。在2015年11月23日,习近平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重申了这一点“要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基于对“社会主义经济不仅具有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共有规律,诸如价值规律、供求规律、竞争规律等等,而有自身的一些特殊经济规律”的认识,习近平提出了“第三,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必须善于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规律探索和把握。”

理论指导实践!习文在对如何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体系提出三点“粗浅认识”之后,提出的

“学以致用”和“切忌用抽象的理论去指导被抽象化的实践”，既指出了建立理论的目的是为了能够更好地指导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也指出了抽象化的理论去指导具体的实践时将遇到的问题。

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根植于中国历史、文化和哲学传统

在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认识中，习近平还有一个重要的发现，那就是新古典经济学、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都共同植根于西方的土地之中，是西方文化、历史、哲学传统的必然产物。习近平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了论证：第一，在对社会经济活动主体的人的认识上，无论是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主流经济学，还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都尚未完全脱离传统西方经济理论的抽象人的框框”；第二，在对社会经济关系的本质的认识上，无论是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主流经济学，还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都可以从中看出传统西方经济学物化社会经济关系所留下的影响”；第三，在对人的主观因素对经济活动的影响的认识上，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凯恩斯主义主流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虽然都比传统西方经济理论有了新的提高，但仍然不够深刻和全面”。

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习近平不是泛泛的介绍，而是给出了具有“原创性”的分析，强调了人的主观因素所产生的影响和嵌入社会经济关系中的人的重要性。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天人合一’的古老哲学命题。这一命题的中心问题是‘天’与‘人’的关系，认为‘天’就是大自然，也即西方哲学中所讲的物质世界及其内在运行规律；所谓‘人’就是指人类，即芸芸众生的凡人；‘天人合一’，就是大自然与人浑然结合为一体，也即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在‘天人合一’的命题中，天与人并未有主从之分，但由于传统中国哲学偏重于伦理哲学的研究，习惯于以人为出发点并以人为落脚点来认识事物，一以贯之的是一种建立在人与人关系基础之上的‘人—物—人’也即‘主—客—主’的思维框架，这与西方哲学的‘人—物’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物—人’的思维框架与认识路线是明显不同的。同时，中国儒教在数千年中形成的忠君报国、崇尚民族利益的文化背景与道德规范，也与西方崇尚个人主义的文化历史氛围有着明显不同。将这种思维框架和道德规范引入社会经济活动之中，人就不再是抽象的人，而是活生生的社会人；社会经济关系也不再是西方经济理论中那种抽象为某一种类型诸如商品、资本、劳动或人与物的单纯或单向关系，而是一种以复杂的人为主体的错综复杂的利益和感情关系；人的主观因素对社会经济活动的影响和作用也不再局限于个体的人或某个具体范围，可以随心所欲地渗透于社会活动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

由于中国有着不同于西方的文化、历史、哲学传统与环境，使得一些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原理、管理方法和技术手段在引进中国之后，往往难以取得预期的效果，有些甚至失灵或者发生了反作用。这就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植根于中国的土地之中，建立与中国文化、历史和哲学传统和环境相一致的政治经济学。

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必须充分发挥经济与政治两个优势

在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领域，“政治”一词常常被妖魔化，几乎等同于意识形态，即便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如火如荼建设的时下，对于“政治经济学”中的“政治”本身的含义也很少有正确的理解，更不要说政治与经济的关系了。习文关于政治与经济关系的论述，拨云见雾，对于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具有重大意义。

习文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入手阐述了经济与政治的关系。对于马克思所揭示的经济与政治关系论述，习近平没有选择《〈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引用而是选择了马克思在《资本论》脚注中校对过的论述，即“‘一定的生产方式以及与其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简言之，社会的经济结构，是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

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进程’。”习近平认为恩格斯从另一个方面深刻阐述了经济与政治之间的作用与反作用的关系“这是两种不相等的力量的交互作用：一方面是经济运动，另一方面是追求尽可能多的独立性并且一经产生也就有了自己的运动的新的政治权力。总的说来，经济运动令政治权力替自己开辟道路，但是它也必定要经受它自己所造成的并具有独立性的政治运动的反作用，即国家权力的以及和它同时产生的反对派的运动的反作用。”通过两个方面的原理综合而合之，习近平得出了经济与政治关系的结论“经济是政治的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经济决定政治，政治也会反作用于经济，彼此互相依存、互相促进、互相对立、互相制约。”

在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经济与政治关系论述梳理之后，习近平很有把握地写道“经济离不开政治，政治也离不开经济，这是客观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经济政治化和政治经济化，应是经济和政治辩证统一关系和谐发展的集中体现。”但是，长期以来政治与经济关系经常被扭曲，例如，在“文化大革命”中“经济就曾被高于一切、大于一切、重于一切的政治挤到了被人们所忽视的偏僻角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长期失衡的经济与政治的关系才趋于和谐。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经济与政治关系，习近平做了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论述，他讲道：

“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为实现政治与经济的辩证统一找到一种迄今为止的最佳形式。在这一体制下，一方面是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为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开辟了广阔空间，使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更加雄厚、经济内涵更为丰富，形成了显著的政治经济化特征；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发展也推进了政治体制的改革，并在优化经济资源配置的同时，优化了政治资源的配置，使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不断加强，社会主义制度进一步趋于完善和巩固，经济政治化的特征和运动趋势也更加显著。”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虽然有利于实现经济与政治的有机结合，但这种结合并不是自然而然形成的，而且还存在不利于结合的一些因素，正如习文所讲，“在政治方面，传统的计划经济观念、僵化的政治意识和‘左’的思想的影响，在妨碍着市场经济和政治经济化的发展；在经济方面，市场经济一些消极因素的负效应，也在对社会主义政治产生着负面影响。例如，市场主体的多元化以及市场主体对利益最大化的追逐，必然要求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多元化……”为了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两个方面的优势，习文结合实例给出了必须把握好的三个重要的环节：

“一是要善于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遇到的问题进行科学分析。例如当前在经济领域中存在的国有企业产权不清、管理不善、效益不好等问题，有不少是决策者的素质和组织上用人不当造成的。”

“二是要善于在实际工作中去深入认识和发掘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两个方面的优势。能够集中财力办大事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一大经济优势，党的领导、群众路线、思想政治工作则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三大政治优势。而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一些人将社会主义所具有的优势忘却了，特别是对群众路线、思想政治工作的优势忘却的人更多一些。”

“三是要善于通过换位思考去充分认识和发挥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巨大优势。当前，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中普遍存在着的一个问题，是搞经济的总是从经济角度考虑经济问题，搞政治的则总是从政治角度考虑政治问题。结果是两方对彼此的工作都不了解，发现不了对方的优势，甚至对一个涉及双方的共同问题的认识也难以达成共识，更难以将认识上升到新的高度。”

习近平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如何正确把握经济与政治关系的论述，不仅厘清了经济与政治的关系，指明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必须充分发挥经济与政治两个优势的方向，而且也成了正确理解中国道路，揭开“中国奇迹”神秘面纱的法宝。

七、结束语

在1997年的《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时代意义》和1998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与完善》论文的基础上，习近平在2001年发表了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和理论品质的论文《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再认识》，对《资本论》是否适合指导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社会

主义与市场结合是否相容和如何融合、如何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与中国文化相结合、如何以《资本论》为主干、兼收并蓄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从而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如何发挥经济与政治两个优势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基础理论问题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得出了一些具有重大理论意义的结论,成为习近平主政后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主要理论来源。

论文《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再认识》在许多方面做出了开拓性研究,解决了一些我国长期以来没有解决或不敢触及的问题:政治经济学主要研究对象究竟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指导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时的缺陷和局限是什么?社会主义是否与市场经济相容?我国与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三大理论体系的文化底色区别是什么?究竟如何对待西方经济学?经济与政治的关系是什么?这些问题的解决对于我们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基础,结合中国实际,借鉴西方经济学现代工具和文明成果来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 [1]曹典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唯物史观意蕴》,《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7年第4期。
- [2]樊纲《现代三大经济理论体系的比较与综合》,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 [3]恩格斯《反社林论》(中译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 [4]郭冠清《回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核心命题的重新解读(上)——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二版(MEGA2)为基础》,《经济学动态》2015年第5期。
- [5]郭冠清《回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核心命题的重新解读(下)——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二版(MEGA2)为基础》,《经济学动态》2015年第8期。
- [6]郭冠清、陈健《社会主义能够解决“经济核算”难题吗——“苏联模式”问题和“中国方案”》,《学习与探索》2016年第12期。
- [7]林毅夫《中国经济学理论发展与创新的思考》,《经济研究》2017年第5期。
- [8]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单行本)(中译本),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 [9]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中译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 [10]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译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 [11]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中译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 [12]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中译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45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 [13]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中译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46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 [14]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译本),《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版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版。
- [15]王立胜、郭冠清《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来源》,《经济学动态》2016年第5期。
- [16]习近平《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时代意义》,《福建论坛(经济社会版)》1997年第1期。
- [17]习近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与完善》,《经济学动态》1998年第1期。
- [18]习近平《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再认识》,《东南学术》2001年第4期。
- [19]习近平《发展经济学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兼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借鉴》,《福建论坛(经济社会版)》2001年第9期。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北京 100836)

(责任编辑:陈燕)